

弗雷德·纽曼与方法的实践

洛伊丝·霍尔兹曼¹

弗雷德·纽曼，一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今年七月份去世，享年 76 岁。今天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就是对纽曼的介绍。他在纽约影响深远，远超出了*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非轻描淡写所能形容”。纽曼是我 35 年来的战友和导师。至今我仍然在参加他曾经领导的群众社会运动和他组织追随者们建立的作为挑战和转变美国心理学、文化和政治的方式的机构。

纽曼是一位兼收并蓄的非传统的革命者：一位方法论家，社区组织者，哲学家，政治战略家，治疗家，教师，剧作家，戏剧导演，词作家。他发现和发展的自己的才华与技能，他设计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几个非常成功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的全球意义正在与日俱增。三十多年来，我有幸作为一个内部的知情人，而不是疏远的研究者钻研纽曼的工作，我和他在同一时间一起建设，一起学习。我希望我今天的发言能概述纽曼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它既生产了革命变革的新单元，又是这种新单元的产物。这就是纽曼所说的“发展性社区”。

我将强调他结合心理学与社会治疗的独特方式。它不仅对美国人民的组织影响深远，而且越来越多地对世界各地的基层组织者和革命家的努力，乃至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做出贡献。因

¹洛伊丝·霍尔兹曼，纽约东边研究所所长（译者曾在该研究所短期培训，并从该研究所的国际班毕业），曾任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维特根斯坦与维果茨基结合在一起研究学习、发展与心理治疗，对传统主流心理学展开批判。译者王波，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Email: herschelwang@gmail.com

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心理学家来说，我相信人类情感的（重新）组织和发展是（重新）组织和发展社会总体的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

纽曼曾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卖过鞋，当过工人。后来在美国大学教育还免费的时候上了大学。1965 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科学哲学与语言学博士学位。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与世界的动荡使他变得激进。像数百万其他的人一样，他感受到了资本主义成功的矛盾——它既造福人类，又生产了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的文化运动通过基层的社区实验转换日常生活挑战着西方对个体自我利益美化，纽曼对此深有共鸣。他从内心感到需要面对这个事实，即美国未能诚实地对待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因为美国的黑人人口仍然生活贫困，被美国的繁荣拒之门外。

纽曼认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是来自大学校园，于是他停止教授哲学，并离开了学术界。他带领少数学生追随者，临近纽约工人阶级居住区成立社区，组织群众。由此伊始，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种发展性社区在美国和全世界已经增长到数以万计。

就这样纽曼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尽管他对作为历史理论、社会关系分析和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表示赞赏，但是对纽曼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是其革命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正如我们所理解和接受的那样，这种方法论不是实践的另一种方法。它远远不止于此，这种方法论更革命和更实践。它是对理解的全新理解。不是像典型的那样“被理解”为与活动分离，或者先于活动，而是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理

解为方法的实践 (*practice of method*)。纽曼 (与我) 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实践的, 这种实践不是从一种理论和/或方法引出的实践, 而是本身就是实践的理论 and/或方法。正如纽曼所说: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唯物主义。实际上, 它的定位根本不是本体论或认识论, 而是从一种哲学的基础全面转移到了一种方法论的视角——根本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 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改变。马克思试图发现一种适合于改变世界的方法论。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活动——一种方法的实践——就是他的发现。

纽曼是如何看待这个他致力于改变的世界的呢? 他的制高点就是立足实地, 自下而上, 而不是追逐理论, 自上而下。这个制高点来自于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建设的东西, 及其与世界上其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发展着的东西的关系。他的分析是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 其众多结果之一就是指认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达及的吊诡处境。简言之, 共产主义是一项意识形态驱动, 在基础上被证明是正当的制度。其根源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哲学/基础著作。虽然它已经被很多人推进和修改, 但仍然在方法论上是基础和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相对于共产主义和其他制度, 资本主义 (这里我再次简单化了) 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它对一个明确的基础结构的依赖更少。对应于这种不同,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据不同的改变原则的运作。对资本主义来说, 它是实用主义。对共产主义来说, 它是辩证法。

毫不奇怪,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种历史性互动同时是辩证法的和实用主义的。根据纽曼, 尽管辩证法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 实用主义服务资本主义远比辩证法服务共产主义更

好。纽曼认为, 这是因为除了“有用的东西” (几乎不是激进的立场) 之外, 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基础, 从而实际上帮助资本主义演变为其当今的新自由 (neo-liberal) 主义形式。与之相反, 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结构理论的辩证法, 因为它未能使共产主义充分灵活地面对迅速变化的全球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纽曼提出, 作为世界公民, 我们发现自己身在这种处境中: 理论上更激进的辩证法为共产主义保守地发挥作用, 而理论上较为保守的方法论, 即实用主义, 却在为资本主义激进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作为方法的实践的辩证法, 而不是作为实践的结构性理论的辩证法, 来理解和改造当前的资本主义, 来理解和发展当前的共产主义。

方法的实践包括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机构——政治的, 文化的教育的和心理学的——以挑战这些机构的基础。比如, 1980 年代我们我无组织的劳工 (接收社会福利救助的人, 不劳动, 因此不处于生产的任何环节) 创建了一个工会。我们为孩子们建设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拒绝作为东西方学校教育基石的个人化的、知识寻求模式的学习。我们目前的项目是情感援助取径的社会治疗中心。它拒斥主流心理治疗的前提: 它是一座免费的大学, 没有年级和学位, 向每一个想参与的人开放; 它是一个青年人才展示的国家网络, 否认资产阶级的人才观; 它是一个与选举有关的政治运动, 但并不关心其输赢; 它是政党, 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重新定义政治和改造政治文化——包括废止政党作为公民参与模式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你想象当一艘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你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重建它, 你就能理解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建设和重建旅程所需的组

织，以发现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即使这样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沉没”的风险。

在纽曼的领导下，他的发展性社区通过这种实践-批判组织 35 年来一直在成长。这里是在全世界正在实践这种方法的一些人，一些地方和一些活动。（出示幻灯）

这种组织活动将纽曼和我带入新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泛言之，指一种这样看当前历史时期的方式，于我们以前的理解和存在方式不再有效（即使人们和机构仍在继续抓住这些方式）。我们的宏大叙事土崩瓦解，真理的存在不断被辩论，人的主体性碎片化，意义本身不断被破坏，重建，然后再被破坏。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人类生活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模糊而无边界，是关系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是地方的和全球的，而不是普通的，是叙事的，而不是以真理为基础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帮助纽曼将马克思后现代化的是两位在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思想家，一是在 1920-40 年代写作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试图实践一种没有本质、真理和意识形态预设的新哲学。另一位是在 1920-30 年代写作的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维果茨基试图用马克思的革命活动概念（实践-批判活动，辩证法）创建一种作为发现过程，而不是一套规则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为了介绍维果茨基，必须回到马克思。让我们检视一下纽曼和我指认的马克思著作中实践-批判思维两条线索：一、阶级斗争；二、革命的活动。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开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明了第一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

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说明了第二点。阶级斗争把反资本主义和解构带到前沿和中心，而革命的活动则将共产主义和重建推到前沿。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就可以改造“所有现存的条件。”

对马克思来说，改造世界和改造作为人类的我们自身是相同的，也是同一项工作。（因为我们既是世界的生产者，又是其产物。）许多对马克思的解读（既有他的追随者，也有反对者）要么忽略革命活动，要么将之作为革命（它只是革命活动的特定类型）归入阶级斗争之下。纽曼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相反，他把它作为对所有人类历史的描述（而不是活动）。革命的活动是所有人类历史的活动，一种“始终在生成”的独特工具——这历史的这一点上同时是反资本主义的和建设性的——通过它人类就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认为（和马克思一起）：一、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他能够开展革命的活动；二、开展革命的活动对不断持续的个体与种系发展是必要的，我们将人归结为革命者，意即归结为从事日常的、世俗的事务的世界历史性（world historic），归结为从事总是在生成着的生活/历史创造过程的社会存在。因为，如果不是辩证法，历史和创造历史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在生成？这就是维果茨基所由而入之处。

维果茨基和他的同事们是一项伟大的现实生活实验的一部分。从 1917 年苏联成立，一直到 1930 年代中期，这项实验要创造一个被期待的新的苏联社会。我最喜欢的维果茨基的一句话就是：“一场革命解决的只是历史提出的那些任务。”对他和他的同行而言，这些具体任务已经由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

革命提出来了。而维果茨基就将自己献身于在当时的心理学中发动革命以解决它们。尽管他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分不开），但是他的方法论突破被证明在解决当今历史提出的任务时是可用的。

在 1920 年代，心理学在成为经验和实验科学的道路上迅跑，方法问题和分析的单位被激烈辩论。比如，将心理学带进自然科学经验的、实验的方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将人类意识的独特性质从心理学的领域中排除呢？维果茨基不愿放弃对意识的研究。他也不愿满足于两种心理学（一种是主观的，研究精神事件；一种是客观的，研究非精神事件），或者一种将精神事件还原为非精神事件从而绕过意识的心理学。他广泛地论辩到，这两种选择建基于对一种客观主义认识论的错误信念。这种认识论实际上否认作为一种人类（意义创造）活动的科学，并错误地将人类视为自然现象，一如行星和恒星。对维果茨基而言，只要它建立在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分裂之上，作为一种人类科学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发展。在这一点上，维果茨基追随了马克思，并预见了他现代主义。

这促使维果茨基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亦即，整个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技术提出质疑。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可能对研究自然现象有效，但是维果茨基认为它对研究人类不是很适合。他写道，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心理学包含着“一个不可调和的方法论矛盾。它是一种关于非自然物的自然科学”，“并产生了违背这种非自然物的知识体系。”对人类的科学研究（一种“科学社会主义”）需要一种科学的新概念和新实践，尤其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方法——其先决条件就是一种非个人主义的方法构想（*conception of method*）。维果茨

基是这样谈到这种创造性挑战的：“对方法的追寻成为理解心理活动中独特的人类形式的整个事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该方法同时是先决条件和产物，以及研究的工具和结果。”

纽曼和我将维果茨基的提议视为与广为接受的科学范式的一种决裂。在这种范式中方法只是一种被用来产生结果的工具。当方法被应用的时候，工具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工具性的和二元分裂的。纽曼和我称之为工具是为了结果的方法论（*tool for result methodology*）。维果茨基提出了一种性质上不同的方法概念：不是一种被应用的工具，而是一种同时产生工具和结果的作为连续过程的活动（搜寻）。纽曼和我称之为工具和结果的方法论（*tool-and-result methodology*），以捕捉到这个新概念的辩证关系。

通过这一突破，维果茨基通过马克思的辉煌为这一实践问题奠基，即人类如何学习和发展，以及历史条件如何在实际上阻碍了这些过程。但他明确表示，他运用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而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不想补缀一些引文来发现心理的本性。我想在了解了整个马克思的方法后，探究如何建设科学，如何研究心理。”

工具和结果，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历史相关的工具。它汇集了辩证法和实用主义中有用的东西，以创造新事物。作为一元论的辩证法，它为超越几十年来一直困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客观与主观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裂指出了正确方向。从政治和心理学的（即革命的）程度上必须行使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当前可用

的工具的使用者，而是新的工具和结果的集体创造者。本着这一精神，纽曼的组织目标是激励，邀请和帮助人们实践方法，创造新的生活形式，建设同时作为革命的活动的背景和革命的活动本身的环境。

纽曼的社会治疗就是这样一种环境建设活动。它被专门设计来创造情感的一社会的成长。资本主义本体论不承认历史/历史创造，人类只根据我们是**谁**被理解。而社会治疗就是对这种本体论的解构和重构。而我们是**谁**（尤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中的谁则被商品化和异化的个体，一个我们已经适应的生病的社会的产品。改造这个生病的社会必须包括对这个人类产品的去商品化和去异化。这既不是否定的，也不是解构的，而是生产社会性的肯定的和建设性的过程。在社会治疗的过程本体论中，人类既是我们是谁，又是我们正在成为谁。而我们现在成为的那个谁则是工具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能够通过将世俗的具体生活实践不断地改造为新的生活形式从而“废止事物的当前状态”。创造这些新种类的工具就是表达的生成活动（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就是我们的社会性，我们对历史的适应，或者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们的“类-生活”。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改变世界的是人。然而是什么样的人呢？通常的和“正确的”答案是“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纽曼的回答是“正在发展的人”（人—年轻的，年长的，两者之间的，正如你在幻灯片里看到的）。对个体、阶级和物种而言，发展并不来自于某些抽象的意识形态承诺，诸如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或者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只能来自一个参与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行使他们的集体力量，以创造新的环境和新的情感成长。这就是已经在发挥作用的马克思思

主义的治疗化（therapeutization），纽曼催生了这种社会治疗和发展性社区。这种治疗的线索就在马克思的著作之中，正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所说的：“我们还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的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²

当我告诉弗雷德·纽曼我被邀请到这里给大家作报告时，他很高兴。在他和我能商量我在这里可以报告什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感到了这种损失。但是依照他毕生的实践，我想他将我们的反应非常感兴趣，因为正是在我们共同创造的对话中，我们才有生成的可能性。我们能成为什么取决于我们自己。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